

传播与文化
译丛

跨文化传播学： 东方的视角

[美] 史蒂夫·莫滕森 编选

关世杰 胡兴 译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Eastern Perspectiv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Eastern Perspective

跨文化传播学： 东方的视角

[美] 史蒂夫·莫滕森 编选

关世杰 胡兴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文化传播学：东方的视角 / (美) 莫滕森 (Mortenson, S.)
编选；关世杰，胡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2
(传播与文化译丛/常昌富主编)

ISBN 7-5004-2563-5

I. 跨… I. ①莫… ②关… ③胡… III. 文化-传播学-
研究-东方国家-文集 IV. 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6671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插页：2

字数：318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22.00 元

编委会名单

主编 常昌富
编委 常昌富 李依倩 胡瑞敏 王顺珠
顾宝桐 白秀成 Daniel Wilbur
Steve Mortenson Alex Leidthold
Jo Anne Holman Don Burks
Robert Ogles Ralph Webb
Glenn Sparks 关世杰

FF66/0P

“传播与文化译丛”简介

传播学 (Communication Studies) 的兴盛是 20 世纪西方学术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自本世纪初第一个演讲学系在美国诞生, 现代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而充满活力的学科便开始了不凡的学术之旅。如今, 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设了传播学系或类似于传播学系的演讲学系、修辞学系、言语交际学系以及大众传播和新闻学系。当其他一些传播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生源不足时, 传播学则蒸蒸日上, 一跃而成为学生人数最多的学科之一。与此相对应, 传播学也形成了庞大的研究队伍, 有几十种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专业刊物, 有几十个在理论界颇为活跃的学术团体, 而且有一种更为国际化的趋势。

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可以说, 从 20 年代开始以演讲和话语为研究主体的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为现代传播学播下了种子, 做了理论准备。本世纪初, 特别是四五十年代之后新闻传播业的繁荣给传播学带来了新的内容, 大众传播学成为重要的领域。其后, 人际关系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跨文化传播学等等研究领域的相继学科化, 使传播学有了更多的、公认的学术空间。今天,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一个传播意义上的“地球村”在人类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 传播和交往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仿佛是在一夜之间, 交往和传播变得如此普遍、如此重要, 它们成了我们现代人

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

改革中的中国正从古老、封闭的社会向新型、开放的社会转变，人际交往行为的激增、大众传播业的繁荣、民主意识的觉醒、国际活动的广泛参与，为中国传播学的崛起提供了内部和外部条件。

中国需要建设什么样的传播学？中国的传播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何意义？如何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话语和传播方式，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更好地了解别人？这一系列问题摆在中国学人的面前。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编选了这套“传播与文化译丛”。“译丛”将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一个世纪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传播学进行梳理和评价，为中国的传播学的建设做一份“传播”的工作。

跨文化传播学： 东方的视角

——编者序

史蒂夫·莫滕森
(Steve Mortenson)
关世杰 译

前 言

文化与传播关系的研究是传播学研究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世界各地的学者们正在共同理解人际交流中文化对双方互动的影晌，描述不同文化实行互动的不同模式。学者们常常引用马歇尔·麦克鲁汉 (Marshall McLuhan) 的“地球村”比喻，描绘公司和教育机构中多种文化环境和跨文化交流的增多。当今，人们更容易结交讲着不同语言的同事、同学和邻居，亲身体验不同文化的社会实践和价值观。

本书的目的是想通过与中国学者共享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和视角，为传播学学者们的“地球村”做些贡献。我们选编这本书为的是使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学者在文化和传播学领域的著述。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做三方面工作。中国和西方学者经常在人性、知识的特点、达到理解知识的方法上有不同的前提并被这些前提所影响。鉴于此，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讨论和阐明中西文化在思维和哲学上的差异。这样，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西方人在他们探究文化和传播的关系时，会使用某种类型的方法，做出某种类型的结论。我们的第二项工作是对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理

论与实践的主导范式提供解释。像霍尔 (Edward T. Hall) 提到的语境或霍夫斯泰德 (Geert Hofstede) 提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形式和基本尺度, 都是许多研究者引用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在本书中, 对作为理解文化和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还进行了介绍。由于西方社会科学范式与中国大多数学者探究的描述人类行为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因而提供这类范式的解释可能有助于读者对后面文章的理解和批评。我们最后一项工作是提供在跨文化传播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指探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互动的研究) 研究与传播文化对比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指对照比较两个不同文化的传播) 研究的一些实例。我们希望, 通过共享这些研究, 将不仅有助于中国学者理解西方同事正在做些什么, 而且还有助于在东西方学术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本书的着眼点和论文的选择

本书是为传播学领域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编选的, 着眼于东方主题。跨文化传播学和传播文化比较学探讨全球各种文化的种种问题。本书所选论文的“文化焦点”集中在中国文化和韩国、日本等东亚文化。尽管这些文化在语言、历史、社会生活上有很大不同, 但它们都有儒家、佛家、道家哲学 (西方学者认为它们是一个主要文化) 的共同传统。通过挑选专门论及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论文和文章, 我们希望能提供给读者一个熟悉的文化环境, 去理解西方学者关于文化、文化与传播关系的观点和所作的比较研究。这本书也集中谈及了东西方哲学上的根本差别。东西方思维上的差异常常是文化对比研究领域里一个经常讨论的话题。在这一讨论中, 西方思维通常被描绘成是一种受到了希腊罗马传统影响的线性的 (linear)、分析 (analytic logic) 思维; 与此相对照, 东方思维经常被描绘成体现了儒家和道家思想, 强调

的是更为图形式 (configural) 的和整体的 (holistic) 认识世界的方式。

像大多数要理解人类及其互动的学术努力一样, 传播文化比较研究运用多种方法探索有争论的观点和假定。例如, 用后现代理论或现象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所得出的思想和理论与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学者们得出的思想和理论有很大的区别。在传播文化比较学领域里占主导的探索范式是社会学。本书中大多数文章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运用定量分析, 而不是民族志式的或定性的分析。尽管这种方法并非未受到批评, 但是在传播学领域, 读者广泛的、受到重视的期刊发表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类型的文章。

我们希望这种侧重会有助于中国学者探究和理解西方学者在从东方视角来描述传播时提出的主要思想、调查方式和研究方法。

西方学术中的东方式传播：西方思维 和社会科学传统概观

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反映了研究传播文化比较学的社会科学方法。然而这些文章中几乎没有讨论作为文化和哲学传统一种产物的社会科学本身。在本书简要概观中, 我简要地谈了谈东西方思维和哲学传统的差异 (深入的分析见本书第三篇成中英关于中国哲学与传播理论的文章)。我谈的是西方在思维和哲学方面的文化传统对有关人、知识和获知方法等方面的社会科学假设的影响。

获知方法：东方与西方

在传播文化比较研究领域的学者们, 常常把西方的思维描绘成是一种直线式的逻辑思维。直线式逻辑基于古代希腊罗马哲学

家们所承继下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见 Kaplan, 1988; Goldman, 1992）。在直线式逻辑思维中，一个事物是通过与一个基础的、不变的、显露的真理的关系来加以理解的（见 Ames, 1991）。在直线式逻辑中，其重点在于通过“一”去理解“众”。换句话说，一项普遍的真理被运用来解释许多特定现象的特性。直线式逻辑分析一个现象时，把它与基础的和不变的原则对照或对比，以便理解该现象的特征（见 Ames, 1992）。这种思维产生了特定现象和基础原则（基础原则决定现象）的一种二元分离（见 Ames, 1991）。

这种直线式思维明显地体现在归纳式和演绎式逻辑中，通过演绎逻辑，思想（大前提）被分解成各个部分（小前提），分解的各个部分必须必然地符合归纳出的思想（大前提）以形成一个关于它们如何相互关系的结论（见 Jensen, 1981）。归纳逻辑分离出特定的一些现象，然后互相对比、对照以形成一个关于这些现象特性的一般性结论（Jensen, 1981）。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都是直线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思维或是直接地从一般性前提向一个特定个案流动；或是从一个特定个案向一般性前提流动，以便形成一个结论，说明一个特定现象如何与一个一般性前提互相关联（Jensen, 1981）。

与西方思维的希腊罗马传统相对照，在传播文化比较学领域的学者们常常用儒家、道家和佛家的传统去描述东方的思维，东方思维被描绘成运用图形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直线式的逻辑思维方式。

在图形性逻辑的方式中，一个现象是通过它与另一个现象的关系来加以理解的。图形式逻辑的重点是通过“众”去理解“一”；换句话说，一个特定的现象不是通过一项不变的原则来理解的，而是通过在不同环境中与其他多种现象的关系来理解的（Ames, 1991）。这提供了各种现象如何以复杂的模式和体系相互关联的整体视野。“因而，描绘任何特定的现象……需要追溯

和阐述各种现象情境中的相互关系和条件，以及各种现象的多种关联”（Ames，第 221 页）。图形式逻辑是从不同的观点，而不是直线，去探究理念的（Kaplan，1988）。现象是以它们如何与一个体系相关的形式去加以理解的。这与西方直线式逻辑形成了对照。直线式逻辑是以与普遍原则的关系的方式来分析现象，以便去理解这些现象。

图形式逻辑产生了一种非线性思维关联。理念被“结构”在一起以便展示相互关系的模式，以解释这种关系而产生对理念的理解（Ames，1991，第 101 页）。结构思维关联并不是沿着从一个特殊理念到一般性结论，或从一般性结论到特殊理念的线性思维模式。图形思维则沿着从一个特定的理念到许多其他相关的理念，绘制和“找出那些聚在一起并形成一种独特组合的事物之间的关系”（Ames，1991，第 100 页）。

图形关联思维明显地体现在强调各现象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禅宗、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东方哲学传统之中（Ames，1991）。西方哲学强调的是双重的角度，这种角度建立了“……一种在决定性原则和它决定的事物之间的本体论的分离”（Ames，1991，第 100 页）。这种分离源自一种概念，即直接的、可触知的现象在其特性上只是暂时的，而决定和规范现象的原则却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改变（Ames，1991）。与此相对，东方思想强调“……基本的相互关联的一对，它体现在世界具体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依赖、多样性和动态的互动中”（Ames，1992，第 99 页）。

早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几个世纪的禅宗、儒家和道家的哲学家们不需要考虑直线式的思维模式去增加自己的理解。禅宗经常使用“以心传心”（koans，译者注：以一种简短而不合逻辑的问题，使思想脱离理性的范畴），用不可解决的词汇纠缠（例如，在你父母诞生前，你最初的面目是什么？）去说明在充分描绘现实方面语言和逻辑的无能（Becker，1988）。儒家

尽力去综合对立面以便避免二元性 (Ames, 1992)。道家强调在语言上和逻辑上做出区分的人为性。道家认为, 这种区分产生了二元性, 二元性没有能力把握经验的全部和真实的世界 (Becker, 1988)。

很明显, 西方和东方学者们来自不同的思想传统。与东方思想学派相当不同的西方的分析传统仍然存在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核心之中。在下一部分我将谈及西方的思维方法是如何影响了许多在社会科学探索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性假设。

现象世界的特性：经验主义的假设

科学哲学的学者们和科学家们都认为现象可以被感知, 它存在于稳定的、其特点和机能依赖于其他现象的关系之中。现象被认为是分析的对象, 独立于试图了解它的人。现象之间的关系不是由探究的头脑所建构, 而是作为自然发生的模式被发现 (Andersen, 1996)。

正是对这种模式的探索, 对现象中可预见性的探索, 推动了科学事业。正如汉娜 (Joseph Hannah, 1991) 所说:

科学的目标是使经验世界得以显现, 以便使我们去解释和预见我们感兴趣的现象, 不管这些现象存在于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之中, 还是存在于传播学之中。简单说来, 经验科学的目的是要提供关于世界的客观信息。(第 202 页)

人类行为的现象被认为由可以预见的模式所支配, 这些模式可以被科学家的经验所接收。对传播学者来讲, 问题就变成了: 经验可以接收到的人类行为模式是由什么组成的? 个性的特点是不是经验的本质? 文化价值观是客观事实, 还只是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产物?

科学家根据经验，宣称这类模式存在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建立标明模式显现条件的能力。例如，金（Kim）和威尔逊（Wilson）在本书第五章的文章里就探讨了文化对谈话中被称之为互动抑制的影响。互动抑制涉及的是：对谈话对象感情的伤害；避免被谈话对象的消极估价；清楚地了解一个人正在说什么。金和威尔逊让人们读了一些假设的情景，如目睹一位朋友在讨论中做了一个糟糕的发言，然后让这位朋友问：“我讲得怎么样？”金和威尔逊然后问被调查者：表达清楚与避免伤害朋友的感情而不消极地评估朋友的演讲，对他们的重要程度。在金和威尔逊研究中的被调查者必然要在两者中选择一种更为重要，是谈话的意思清楚重要呢，还是保住一位朋友的面子重要。

通过设定要求人们在两种考虑中选择其一的条件，金和威尔逊可以观察到，基于上述情形，什么对被调查者最重要，行为中的某种模式就会出现。假如有足够多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朋友的面子比表述清楚更重要，那么研究者就可以认定，这是人们行为的一个可预见的模式。通常（虽然不是总是），科学家通过模式特点的假设，努力在现象中去预见模式。例如，金和威尔逊的假设之一是预见韩国人会认为保住朋友的面子比点明朋友糟糕的演说更为重要。

设想的模式如何通过经验加以证实呢？在金和威尔逊的研究中，被调查者填了含有一系列问题的问卷，被调查者在问卷上的回答是经验性的事实，回答中包含科学家的解释。金和威尔逊认为，在阅读人们对问卷的回答中，可测量的经验性模式将与人们在与他人交谈所体现的行为模式相一致。这里的假设就是：通过依靠测量的方法（在这个个案中对问卷的回答）来界定互动的抑制行为，我们可以认定从经验上接近对人们行为的那种影响。这种形式探索的另一个假设是：语言具有参考作用，它对现象的参考作用可以用它勾画出被调查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用

语言询问人们在对话中的有关问题，用语言查询人们在实际交往中体现的决策模式和行为模式。

本书中有很多研究探讨了文化模式。在第一章中，霍夫斯泰德的文章探讨了他称之为不同文化的价值尺度。他认为，来自同一文化的人们在自我与他人、不确定性、真理和权力分配方面，维系和体现着可以预见的价值倾向；他进而认为一种文化价值观模式可以用来预见一种文化成员的行为模式。

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们利用霍夫斯泰德的研究成果做了很多研究。文化背景的差异常常被用来预见行为模式。在金和威尔逊的研究中，文化背景的差异被用来预示人们认为谈话中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弄清朋友谈话的意思重要，还是保住朋友的面子重要。这些研究者利用一种模式（文化价值观）去预见另一种模式（个人行为）。换句话说，就是研究者寻求去确定文化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一种假设：原因产生了结果，结果中会有原因。在金和威尔逊的研究中，特定文化模式是原因，特定行为模式是其结果。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不争论严密的因果关系模式去描绘人类的行为。然而大多数人探讨一种条件关系，即原因的显现增加了理解后果的可能性（Andersen, 1991）。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者们主张各现象之间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大多数研究者们在社会科学中使用的方程式，被设计用于以可能性的形式评估一种现象对另一种现象的影响。

在金和威尔逊的研究中，把问卷的回答加以量化，进行统计分析。这是传播文化比较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例如，金和威尔逊让被调查者阅读一些假设的情况后，对下面的说法做出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把我的观点尽可能清楚地、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非常重要。

1	2	3	4	5	6	7
坚决 不同意	很不 同意	不同意	无所谓	同意	很同意	坚决 同意

被调查者在自己同意项目的数字上画圈，以表示他们同意或不同意的强烈程度。这是对回答加以量化的一种方法。对所有问卷中的回答加以统计分析，就揭示出了被调查者所做回答的量化模式。利用这种方法，金和威尔逊寻找韩国人和北美人对清晰表达或是保住面子的模式。

总之，西方思维的古代传统在当代社会科学的假设和实际操作中仍然非常活跃。像古人一样，社会科学家们做出了一些假设，即通过总结出一些规则用以理解现象间的相互影响。直线性逻辑是建立关系以标识现象中可以预见的、因果模式分析实践的核心。简言之，社会科学就是关于描述和预言模式的科学。本书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试图描述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规范传播行为的文化模式和基本原则，这些文章代表了通过西方人的眼光对东方的看法。本书中的研究通常对东方文化和北美文化进行了对比。这些研究者认为，东方文化中的传播与西方文化中的传播被不同的、而不是可能预示的因素所制约。

研究文化与传播的不同角度

强调社会科学假设、量化手段和检测假设构成了传播文化比较研究的主流。但另有一些社会科学学者则采取定性分析方法研究文化和传播。定性研究方法常常不追求预示文化现象和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这类研究追求的是描述而不是预见。使用定性方法的研究者通常与人们访谈，而不必填问卷或参加实验室研究。他们很少搜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这类研究者对被访谈者的谈话内容做笔记，从被访者的回答者中寻找模式。定性化研究者经常

进行结构性的观察。例如，从事儿童研究的人可能花费几个小时观察玩耍的儿童，并对发生的事情做笔记。这些笔记就成为资料。另一种定性研究是进行个案研究，研究者集中研究一个家庭、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目的在于产生关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丰富详细的资料。进行个案研究的学者经常不认为有必要总结他们的发现适用于更大的人群。他们的兴趣在于特定的具体案例，而不是一般性的抽象原则。

另一类的定性研究是民族志方法。这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通用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也被运用到传播学研究。民族志方法通常要求研究者把自己“沉入”正在研究的环境中。从事学校儿童环境研究者所花的时间不仅仅限于在校园里观察孩子们玩耍，还要观察、探索学校、教室、游戏场地和其他儿童交往的地方等所有的环境。通常民族志学者和他们研究的对象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学校从事研究的民族志学者可能作为一个教师的助手或孩子们的辅导员在该学校工作。

最近，后现代理论家，公开对科学实践和假设的批评产生了一些关于文化和传播的研究。贝斯特（Steven Best）和凯尔纳（Douglas Kellner，1991）描述了后现代理论。

后现代理论对理论反映现实和现代信仰提出了批评，采取了“透视的”和“相对的”立场，认为理论最多不过提供了对客观事物的部分的透视，认为所有对世界的认知的表述都是通过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都具历史性。因而，后现代理论反对现代理论所钟爱的社会和历史整体的宏观的看法，而偏好微观理论和微观政策。后现代理论也反对关于社会一致性的现代假定，反对因果关系的说法，主张多样性、多元化、破碎性（fragmentation）和相互决定。此外，后现代理论还抛弃了很多现代理论关于理性的和统一的主体的假设，偏好社会的和语言学的非中心化的和破碎性的主体。

后现代主义向从事科学工作的研究者们公开挑战。虽然后现代主义仍然处于传播文化比较领域的边缘，但是它在修辞学研究、艺术和文学方面影响很大。

传播文化比较研究简史

传播文化比较和跨文化传播这一领域开始于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 50年代初期在外事服务讲习班(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的研究。外事服务讲习班是美国的一个政府组织，任务是培训准备出国、将生活在不同国家的外交家和使馆工作人员(Leeds-Hurwitz, 1990)。当时，外事服务讲习班教授学员学习派往国必需的语言技能。霍尔的工作是向学员提供一些基本的文化人类学训练以补充语言训练。霍尔不久就认识到，一般文化理论的抽象概念对外事服务讲习班中将要到国外工作的学员没有什么实际用途。霍尔发现，学生们对能使他们与东道国的人们互相交往的特定的实用知识更感兴趣(Leeds-Hurwitz, 1990)。霍尔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化如何影响面对面交往。霍尔不是把文化作为一般的宏观现象加以研究，而是从像空间、接触和声调等问题的微观处着手。霍尔的学生发现，有关他们将派往国传播行为的具体事例比一般理论更有用。通过把文化的研究扩大到对传播的研究，霍尔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之父，他的《无声的语言》被认为是本领域里的开山之作。

在霍尔写作时期，跨文化传播与文化人类学密切相联。霍尔的文章发表在文化人类学的杂志上。现在很少有文化人类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互相交往，很少研究文化中像空间使用、接触、声调这样的现象了。同时，传播学研究方法，从定性方法转入定量方法。70—80年代，量化方法和统计分析则稳稳地成为探究传播的方法。在80年代，像霍夫斯泰